

散文獎三獎

一份關於切除和重建 手術的 progress note



白語洸

作者簡介——

白語洸，本名吳博鈞。一九九三年出生。台北醫學大學牙醫系畢業。曾任職撞球館，現為牙醫師，厚紙島寫作基地成員。這是人生第一次獲得文學獎項。

得獎感言——

謝謝淇華老師，在陪我修改的過程讓我明白了這篇作品的寓意：如果不願修改自己，寫出父親對我的愛，它就無法感動人，我也永遠無法諒解自己恨的理由。

謝謝我的父親：也許你早就明白，這些年我是多麼希望得到你的原諒。

一份關於切除和重建手術的 progress note

「你怎麼那麼慢啊？」

「抱歉，我還在修改切除和重建手術的那一份 progress note（病程紀錄）。」

我常常躲藏在深夜的診療間裡，打開本該處於休眠狀態的電腦螢幕完成未竟的病歷，甚至有時候，診間的燈會突然被打開，我會看見提著早餐的同事自身後出現。每當被人發現的時候，我都覺得自己就像是在做什麼壞事一樣，即使我嘗試竊取的，不過是一段時間而已。

對一名實習牙醫師而言，迅速地完成一份病歷並不該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我不知道其他牙醫師是怎麼做到的，即使缺少口內軟組織以及齒列照片，甚至根本沒見過病患本人，僅僅憑藉調閱病患X光片和被訓練出來的推理能力，他們依然能在短時間內完成一份不會被健保局核刪給付的標準病歷。他們說這明明是很簡單的事：查閱那名病患申報的治療項目，回推治療出自的診斷，回想那樣的診斷會有哪些臨床發現，再根據臨床發現臆測出病患當時的主訴。就只不過是一次重新還原的過程而已。

爲什麼我不能像他們一樣，擁有那樣的能力呢？憑空想像出對應的畫面場景，以此去虛構出一個能說服人的故事，即使那個故事並不貼近真實。

比起嘗試解釋，我羞於向其他同期訓練的實習牙醫師和醫院同仁提及這件事：在成爲一名牙醫師

之前，我會做過另外一份工作，即使他們不會真正翻找出我的過去，卻總是提及我的重考身分當做能帶來笑聲的話題。

「如果你還要繼續在那裡工作，繼續跟那些人混在一起，你就永遠都不要再回來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我還待在煙霧彌漫的撞球館裡，用粗毛刷刷拭球檯面、收球後打蠟、擦拭公杆，製作客人的每一份餐點和飲料，每天清洗防火地毯上暗紅色的檳榔渣液和零星的菸灰。

店長是這樣教我的：告訴常來的客人，員工休息室裡有麻將桌，這樣除了球檯費外還能多收打牌的東西；主動遞菸給領頭來球館的國高中生，讓他們在其他同學前顯得有面子，下次自然會再帶更多同學過來；最貴的主桌留給常客，有時陪他們打網子，檯桌的計時才會拉長。罩子放亮一點，放在球檯上外賭的錢不要被來巡店的警察發現。

當發現我年紀特別大的時候，負責牙醫系入學甄試的教授問我，為什麼你還執意要念牙醫系？因為我希望能在牙醫系裡學到修復相關的課程，藉由治療的過程讓病患正常咬合、發音和恢復美觀……我把事先花好幾天查詢整理好的牙醫系系所教學目標潤飾後背了出來，教授邊聽邊翻閱起我那份輕薄的備審資料。

在牙醫系大六實習的這段期間，我已經沒有餘裕再像大一到大五時半工半讀兼職家教老師。某一年正值大學學測放榜季，我詢問起就讀北一女的家教學生堆疊在她書桌上的那些獎狀和資料，她告訴我，那些資料是登錄學習歷程用的。不同於我們以往藉由一份美化過的備審資料，甚至是一次考試的

分數就能錄取某個校系，現在的高中生還必須於在學期間完成一份名為「學習歷程」的檔案，記錄修讀過的課程，寫下自述和反思、展現素養和動機，證明自己是能被心中理想校系認可的學生。

家教學生突然問我：老師，你既然能錄取牙醫系，你當初「學習歷程」檔案的資料裡面是放了什麼啊？

我總是迴避他人關於我過去的提問，所以我沒有告訴面試的教授，我選擇念牙醫系的真正原因。而我時常想回到十年前的那一個夜晚，向父親提問，當他發現家裡又缺失了一筆錢，最終選擇撥通警局電話告發我的時候，究竟在想什麼？

修正過往積累的錯誤，成為一名真正的牙醫師。從臨床實習時遭遇的狀況中學習，不再只是待在口腔醫學院的實驗室裡，對著牙科人頭模型模擬各項術式而已。這是在牙醫系白袍典禮時，系主任對我們說出的期許。

於是那顆人頭開始能聽懂話語，也有了表情，甚至那些無法訴說的疼痛，會成為他眼角滑落的一顆淚滴。這是一項充滿挑戰的過程，但我們也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以前無法在實驗室演練的困難術式，比如在口腔外科開刀房裡才能看見的——口腔癌腫瘤切除和游離皮瓣重建手術。

會好起來的，你狀況愈來愈好了不是嗎？

前幾天，口腔外科晨會結束，我們一群實習牙醫師跟隨主治醫師到第三大樓7A病區查房，我拿著admission check list（入院檢查表）記錄病患過往疾病家族史等等資料時，看著主治醫師對著曾經

歷過一次口腔癌切除和重建手術的伯伯這樣說。

但我內心是存疑的，因為透過手持式都卜勒血流偵測儀，我們發現病患伯伯左側腿部的股動脈血流流速偏低，但右側大腿因為先前的手術已經不能再用來取皮瓣了。我看著主治醫師握著高溫包消過的簽字筆，在伯伯左大腿做了一個明顯的手術標記，我們準備從那裡取下一塊游離的皮瓣，自體移植到病變切除後的缺損區域。他必須再次透過自己來修補自己。

在伯伯準備進行二次手術的前一天夜晚，我躺在值班室的床上，回想著當天早上主治醫師如何向病人告知術前注意事項，解釋術後最嚴重的併發症——連結的血管血流供應不足，導致自體移植的皮瓣壞死；我在腦中反覆演練原文書裡提到的口腔癌切除和重建手術過程的細節——關於我們是怎麼讓血管分離，游離出一段皮瓣的。

我以為那只會是一再重複的步驟與過程：又一次無謂地坐上警車，等著父親在接到電話後帶著怒意前來派出所，我再坐上父親的車回家，而後責罵聲漸漸成為爭執聲，直到父親成為一盞因疲累而暗去的燈，而清晨的光總能將家裡的擺設又還原成先前的模樣。

直到十年前的夜晚，父親不再以責罵原諒我，而是讓我被銬上手銬，讓我所說的一切都成為了呈堂證供，我似乎就失去了對父親的所有記憶。也是從那時開始，我就成為了一片游離的皮瓣，上面連接著一段被硬生切斷的血管。

隔天早晨在八號手術室裡，手術檯懸臂上無影燈調整至最大照度的時候，光線顯得有些刺眼。

我時常在開刀房樓層複雜的動線裡迷路，分不清清潔和非清潔區的走道，連結手術準備和恢復室的走道究竟歸屬於內圈還是外圈。照著SOP，刷手至肘關節上五公分，不讓隔離衣在有菌區垂落，分清手套的有菌無菌面，雙手維持在肩部以下腰部以上視線範圍內靠近手術檯，卻再次被主治醫師嚴厲地喝斥，在刀房所有工作人員的注視下，我又執行了好幾次的無菌操作，必須做到完全正確無誤才被允許上table。我知道那是嚴重的錯。尤其這一次的重建手術失敗機率又提高了許多，任何曾接觸到感染源的疑慮都是不被允許的，我們無法再承擔產生術後併發症的風險。

被趕出手術室後，我望著門外顯示手術中的警示燈，反省整個過程中究竟是哪個步驟犯了錯。

才發現原來我做過最壞的事，並不是因父親的疏忽讓我在叛逆期隨著撞球館結識的流氓們酒駕、聚眾鬧事或者賭博；也不是偷竊父親的錢以償還那些因撞球或麻將欠下的賭債；而是我爲了報復父親當年舉報我，在離家多年後終於重考錄取牙醫系的那一天，我回到家，得意地對著年邁的他說：我已經靠自己翻轉階級了。

我很後悔自己曾對父親說過這樣的話，這總提醒我父親聽見這句話時痛得近乎無法呼吸的樣子，還有我其實是一個很壞很壞的人。

病患伯伯口腔腫瘤切除手術完成的當天深夜，我坐在診間電腦前，重新修改記錄起他的心跳血壓和呼吸速率數值變化，在他真正痊癒出院之前，progress note 必須無限期地延長。

手術完的隔天早晨，我從值班室的床上驚醒，那時手機alfred camera APP遠端連結的螢幕畫面

裡，都卜勒血流偵測儀的訊號不再像因引力而穩定漲落的潮汐，而是變成一種低沉的嗚咽聲。我急奔至第二大樓的加護病房後拍下病患照片傳送到口外ICU群組，那時覆蓋病患口腔的那塊皮瓣已經黑化，歷經十個小時的重建過程宣告失敗。我當下有些錯愕，腦中只記得我曾被嚴厲告知的事項——身為實習醫師，我並沒有向病患家屬解釋病情的權力。

又失敗了！怎麼會？

我站在口腔外科主治醫師的面前，向他吞吐著病患伯伯的皮瓣狀況。而後我們趕至加護病房，我站在病床旁靜靜聽著主治醫師向病患和家屬說明搶救皮瓣手術過後，更長的復原期。

接著將病患推進八號手術室裡，顯示手術中的燈再次亮了起來。這一次，伯伯的左前臂必須留下曾取過皮瓣的疤痕，那是病患做過重建手術永遠的記號。只要全身麻醉的藥劑持續輸注，病患就不會記得手術的過程有多痛了，如果那也能讓我和父親忘記，我們之間無數次縫合過的痕跡就好了。

我好想虛構出一段回憶，關於父親摸著我的頭，為我優異的成績開心，期許我將來能成爲一名醫師的畫面；卻只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總是躲在炙熱的頂樓加蓋隔間逕自做起家庭代工，當我走近渴求他的陪伴，他卻只是把小小的舊電扇轉吹向身旁的我，甚至不知道該怎麼指導我完成國中小的暑假作業。

我很想重建更多與父親之間那些不存在的回憶，是我太擅長遺忘了嗎？還是我愚笨地未能記住它們？又或者僅僅是因為我不敢去回憶父親的臉。

主刀醫師說，時間還沒到，切除過後的重建術式對我而言仍然過於困難，於是我只能用力撐提著組織，帶著距離地想像整個過程，雖然我想再更靠近，看著主刀醫師在顯微鏡下用血管吻合器將血管重新接上的步驟和細節，讓自己有一天也能把兩條原本分離的血管，用肉眼近乎看不見的縫線再重新連結起來，縫合起與自己相隔了十年的距離。當十個小時的重建手術再次結束，我已經失去力氣再向任何人解釋：那種不間斷的強光，其實就和無盡的黑暗一樣讓人害怕，我也終於明白那並不能在冰冷的刀房裡，帶給自己溫度。

過去這十年來，我總幻想白袍典禮的那天，典禮舞台上的燈光打在我臉上，當進行到宣讀醫師誓詞的環節，我跟其他穿著白袍的牙醫師看起來近乎一模一樣的時候，我能因為這幾年的努力，得以被安排在最前方的位置，讓我的父親很容易就能因此看見我。

我希望父親能看清我無法向其他人展露的表情，就像我試著聽清，他從未對我說出的期許，還有那一夜他終於選擇撥通警局電話時，不願說出的話語。

我知道有些過往不堪還原，而不論我再怎麼努力修改自己，這都只會是一份關於我和我父親的，切除和重建手術的 progress note。

即使我心裡明白，現在才完成這一份病歷，似乎已經有些太晚了。
但我真的已經變好了。我很想親口對我的父親這樣說。

與愛相伴的痛

石曉楓

本文在口腔癌病人進行「游離皮瓣重建」的手術過程中，穿插過往「我」與父親相處片段的回憶，二線交織，今昔連結處自然精確，且雙關處處。

作者藉由病人手術重建過程的失敗，對映並指涉想重建也無從重建、想虛構也無從虛構的父子關係，尤其在手術台強光照射下，那些不堪被照亮、還原的，是病人的病程紀錄，也是「我」與父親血脈重新縫合、連結的艱難。因為傷之後還有更大的傷，少時的誤入歧途、父親的失望與報警處理，那是父子關係的表層之傷；更深刻的傷害則在於子輩對於父者所在階級的鄙夷、嘲諷與踐踏。「我已經靠自己翻轉階級了」一句，對照昔年做家庭代工的父親，在孩子走近渴求陪伴時，只能把舊電扇轉向吹拂孩子的童年記憶細節，更讓讀者深沉感知了父者之愛反成為「我」傷害父者的工具之殘酷性，那種令人共感的痛，簡直力透紙背。也因此才會有篇末那句：「但我真的已經變好了。我很想親口對我的父親這樣說。」（前曾言及「我其實是一個很壞很壞的人」。）簡單質樸的願望，背後卻是人子永遠的懊悔，情感深刻動人。